

章太炎的語言學和佛學

汪啓明

四川大學中文系

章太炎是我國近代史上有學問的革命家。魯迅在病榻上完成的《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》高度讚揚了章太炎：「考其生平，以大勳章作扇墜，臨總統府之門，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，並世無第二人；七被追捕，三入牢獄，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，並世亦無第二人，這纔是先哲的精神，後生的楷範。」他又是我國語言文字學承前啓後的人，被稱爲國學泰斗。侯外廬說：「太炎先生在中國近代學術史，是自成宗派的巨人。」¹但是，佛教哲學和他的語言學，曾結下了不解之緣，這就鮮爲人道及了。

佛典曾對我國的語言學產生過極重要的影響，反切的發明即主要受其啓示。此外，佛教典籍的詞匯、語法等，都給漢語注入了新鮮血液。作爲思想家兼語言文字學家的章太炎，他受佛學的影響比其它任何方面都大。1907年，他甚至宣布：「當於戊申披剃入山。」²黃侃回憶他當時「睹國事愈壞，黨人無遠略，則大憤，思適印度爲浮屠」。³蘇曼殊1907年11月28日給朋友寫信說：「前太炎有信來，命曼隨行，南入印度。」⁴他還爲自己取了「末底」和「震旦優婆塞」⁵的別名，並請了一個叫密尸邏的印人教梵文，以爲入印準備。

但是，太炎早年於此道並未登堂，《蘇報》案前與「宋平子交，平子勸讀佛書」，於是他讀了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諸書，但卻「未有專精，卒未窺其究竟」。⁶繫獄後，他讀了《瑜珈師地論》，漸入法門，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機。

《瑜珈師地論》是大乘阿毗達摩的典範，是唯識宗的主要經典。它注重對現實世界的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進行分析解釋。章太炎說：「(唯識宗)以分析名相始，以排遣名相終，從入之途，與平生樸學相似，易於契機。」⁷如果用分析名相的方法治學，

1 侯外廬《近世中國思想學說史》。

2 《自題造像贈曼殊師》，見《蘇曼殊全集》卷五，頁125，戊申即1908年。

3 《太炎先生行事記》，見《制言》四十一期。

4 《蘇曼殊全集》卷一，頁197。

5 「末底」是梵語「慧」的意思，「震旦」指中國，「優婆塞」，梵語居士。

6 《自述學術次第》。

7 《蕪漢微言》。

可以養成實事求是的學風，而避免浮說游談、顛預籠統之弊。他所尊的唯識宗，又叫法相宗。他說：「僕所以獨尊法相者，則自有說：蓋近代學術漸趨實事求是之途，自漢學諸公分條析理，遠非明儒所能企及。逮科學萌芽，而用心益復縝密矣。是故法相之學於明代則不宜，於近代則甚適，由學術所趨然也。」⁸

清代的正統學術，蓋以考釋名物，解釋訓詁為治經途徑。梁啟超曾歸納為十個特點，⁹其中包括：一、無徵不信。所以重證據，重調查研究；二、實事求是。從歷史觀點出發，以求發變化之真實；三、重分析比較；四、重探蹟索隱，鉤深致遠等，都是治學根本精神所在。《瑜珈師地論》就其文字組織形式來講，最初以謁頌為中心，其中法義組織抉擇，日益明確，並有所發揮。這種解釋「法」的方法，就是阿毗達摩（對法），其形式有下列三類：

一、單純對佛說加解釋，由簡到深，名優婆提舍。

二、提揭全文中心思想，由簡單要點，演繹出許多道理，如母生子，名摩坦理迦。

三、分析各種不同的名相，有許多意義相似的，為了決定它們的含義，就分設若干門類，加以區分，決定出一種來，名抉擇。

從外部形式看，這和訓詁學的注釋、章句、多義詞及其引申分化的研究十分相似，也就難怪章太炎說「十分契機」了。

章太炎不僅受其影響，他還用來解決語言學中的實際問題。如論及中國語言起源時，他認為語言的發生，必有他所依據的實體。「語言者，不憑虛而起，呼馬而馬，呼牛而牛，此必非恣意妄稱也。」¹⁰ 語言對於這種實體的表述是有規律的。他把詞分成三類，一種是表示實體的，如「人」、「馬」；一種是表示狀態的，如「仁」、「武」；一種是表示動態的，如「禁」、「毀」。他認為這三者相當於佛學勝論的「德」、「業」、「實」。如果不明「德」、「業」、「實」，就不能「明毛公微意」。¹¹ 他舉例說，《商頌·長發》：「幅隕既長。」《毛傳》：「幅，廣也。隕，均也。」章太炎說：「幅員猶言廣員。《西山經》：『廣員百里』。《越語》：『廣運百里』。『均』者，《說文》：『平徧也』，平徧則廣。舉其實曰『幅隕』，舉其德曰『廣員』、『廣均』。」由此可見，借鑒佛學之名的德業實三品說，可以幫助掌握詞義。

再如章太炎對「名」的形成過程，也用唯識論的「受」、「想」、「思」來概括。他說：「名之成，始於『受』，中於『想』，終於『思』。」他引證墨子、荀子的論點加以詮釋。他認為，「受」即荀子的「緣天官」，「想」即荀子所說的「徵知」。他說：「接於五官曰

8 《答鐵錚》，見《太炎文錄初編》。

9 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。

10 《國故論衡·語言緣起說》。

11 《國故論衡·明解故》。

『受』，『受』者謂之『當簿』，傳於心曰『想』，『想』者謂之『微知』，一接焉，一傳焉，曰『緣』……此名之所以成也。」¹² 從佛教哲學的角度分析「名」的形成，也可見佛學與語言學之關係。他甚至說：「言聲明者，即彼土文字訓詁之學。」¹³

章太炎還注意到「漢人用佛經語」的現象。他說：「漢人引用佛說者，自《楚王英》、《襄楷傳》外，不多見。今讀徐岳《數術記遺》有云：未識刹那之賒促，安知麻姑之桑田；不辨積微之爲量，詎曉百億於大千。『刹那』、『積微』皆出《楞伽經》，『大千』出《華嚴經》。則又得一漢人引佛之彰明較著者矣。」¹⁴ 依據文獻語言，考察古代社會的佛教傳入史，從而進行文化史研究，是語言學研究的重要作用之一。

《瑜珈師地論》等佛學書籍大大地影響了他的語言學，反過來，他又從語言學的角度，考察中國早期的譯經情況。他說：「當漢世安世高、支婁迦讖等，已譯《華嚴》、《寶積》、《般若》之篇。其人既出安息、月氏，於梵、漢語則兩闕。漢朝儒先，經術雖通明，獨短哲學。斯筆授者亦拙。……及晉宋間，士大夫喜老莊，言談始利。老莊於釋典，其術語誠弗能密切，時有相似，則僧肇、道安諸師，又往往傳以清言。」¹⁵ 語言有民族性的特點，又受思維支配，兩通則文義明，偏執一端，終於文意有礙。他分析的譯經情況是正確的。

唯識論影響他的語言學，也影響他的學風，他說如果要做到「研精故訓而不支，博考事實而不亂，文理密察，發前修所未見，每下一義，泰山不移」，就必須「審名實，一也；重佐證，二也；戒妄牽，三也；守凡例，四也；斷情感，五也；汰華辭，六也」。¹⁶ 他又說：「學名國粹，當研精覃思，鈎發沈伏，字字徵實，不蹈空言，語語心得，不因成說，斯乃形名相稱。若徒摭舊語，或張大其說以自文，盈辭滿幅，又何貴哉？」¹⁷ 他的治學宗旨也受佛教哲學的影響，他認為當時最要緊的事有兩件：「第一，是用宗教發起信心，增進國民的道德；第二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，增進愛國的熱腸。」¹⁸ 他所說的宗教正是佛教；他所說的國粹，是指語言文字、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。可見佛教不僅影響了章太炎的語言學，也影響他的政治理想，此不贅述。

12 《國故論衡·原名》

13 《荊漢微言》。

14 《膏蘭室札記·漢人用佛經語》。

15 《初步梵文典·序》，見《別錄》卷三。

16 《說林下》，見《太炎文錄初編》。

17 《再與人論國學書》，見《別錄》卷二。

18 《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詞》，見《民報》第六號。